

《永乐大典》：沧桑历尽续传奇

□ 张雪



《永乐大典》展览深受观众追捧。(国家图书馆供图)

善本的故事

《静明园内溪田课耕图样》——

因“静”而“明” 修身养性

□ 易弘扬

地处北京西山东麓支脉的玉泉山,是自康熙朝即开始兴建的“三山五园”中的一山,同香山、万寿山并称“三山”。静明园则为“五园”中的一园。《日下旧闻考》卷八十五有载:“静明园在玉泉山之阳,园西山势窈深,灵源浚发,奇征趵突,是为玉泉。”

由于静明园中山上山下散布着许多泉眼,这其中最大的一眼名为“玉泉”,所以时间久了,静明园也就被称为“玉泉山”。玉泉山共占地75公顷,其中水域面积为13公顷。清康熙十九年(1680年),康熙帝下旨于玉泉山在原有基础上扩建、修建行宫。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扩建的行宫初步告成,最初命名为澄心园,“澄心”二字应为“心情清静”“静心”之意。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,澄心园奉旨更名为“静明园”,关于此,《清史稿》有“玉泉山静明园初为澄心园,康熙三十一年更名”的记载。这是清王朝在北京建立的第一个行宫,也是“三山五园”皇家园林群开始修建的起始。清乾隆时期,乾隆十五年(1750年)至十八年(1753年)曾对静明园又一次进行大规模扩建,增建了玉峰塔等景观,并且在扩建过程中引进了江南园林的建筑风格,最终形成“静明园十六景”,这时也是静明园整个历史中最为鼎盛时期,而溪田课耕名列十六景之一。

《日下旧闻考》有载:“溪田课耕为十六景之一。园内自垂虹桥以西,濒河皆水田。”乾隆帝爱新觉罗·弘历之所以在玉泉山修建溪田课耕一景,并非是为了游玩赏景,而是在于表达自己对农事的关心,“每过辄与田翁课晴量雨”,这种行为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。在过去数千年时间里,中国古代社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,所谓“重农抑商”,农业自然也是历朝历代君主所关心的重点。乾隆十九年,他曾特地为溪田课耕写下《课耕轩》诗一首:“疏轩倚秀岩,俯畅名课耕。溪田带左近,引水艺稻菘。塍外即高田,禾麦千畦呈。向者偶凭窗,欣闻叱犍声。”从这首诗的意象可以想象出这样的场景:在秀丽奇石上修建起来的亭轩,其旁边即是溪田;此时,不断地有水潺潺灌入。园墙的外边就是千畦麦田。站在窗户旁边,农夫吆喝农作之声清晰可闻。《静明园内溪田课耕图样》可以说是对这首诗的一个鲜明对证:溪田课耕四周除东向外,可谓山石环抱,正对应了“疏轩倚秀岩”;而它的南边越过花砖字墙尚是一大片河池。据载,乾隆十九年的时候,园墙外尚且是广阔的农田。乾隆二十四年之后,开始从静明园西墙到沼泽地之间修建高水湖,并且在高水湖旁边修建养水湖,此处的稻田便不复存在了,代之以附近开辟的新稻田。

国家图书馆馆藏样式雷图《静明园内溪田课耕图样》纵65厘米,横49.5厘米,图中采用不同设色绘制出河流、山间小径、山岩和大山的轮廓,全图样居中为本图主题溪田课耕,四周环绕花砖字墙;溪田课耕右方红底黑字手书:“溪田课耕殿一座三间,各面宽一丈,进深一丈四尺;前后廊深各四尺;小檐柱高一丈;台明高一尺二寸。”下方黄底黑字手书:“南北院当一丈六尺。”溪田课耕东北方向为值房,值房下方写有“值房一座三间,各面宽一丈,进深一丈二尺;高八尺;台明高一尺二寸”的介绍。溪田课耕的西南方向则为平台值房,值房的西、南两边分别写有“东西四丈五”“平台值房一座三间,面宽一丈二,次间各面宽九尺;进深一丈二,尺柱高八尺,台明高八寸”和“南北地基三丈”的字样;图样的上、下、左、右四个方位分别写有北、南、西、东。黄底黑字为原有之建筑或事物;红底黑字的内容为准备扩建的建筑。全图风格简洁、明快,比例真实、准确,体现了绘者较高的绘图水平和素养。

玉泉山之溪田课耕位于京西玉泉山山麓的西部,在水城关以西的园墙之内,在清朝时期时,是一片河池和稻田。这在图样中也同样有表示:在全图的左上角,清晰可见黄底黑字的“河池”二字。在河北岸的山麓,则建有一座课耕轩,这里便是“溪田课耕”一景。

除了溪田课耕之外,《静明园内溪田课耕图样》左侧位于“山道”和“大山”之间的“进珠泉”则是玉泉山有名的泉流。进珠泉在课耕轩以西、距河岸不过六尺五寸的距离。乾隆皇帝还为泉畔一座名为真珠船的水榭题了一首同名的诗:“青蒲载戟石磷磷,错落倾来万斛珍。最是松风萝月下,夜深仿佛见鲛人。”据相关数据记载,直至20世纪50年代,进珠泉的流量依然有0.06至1.15立方米每秒。

静明园以山景与清泉闻名。“静明”二字出自《庄子》《庚桑楚》篇:“正则静,静则明,明则虚,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只要心神端正就能保持宁静,常保持宁静则内心明澈;明澈的内心则把人引向心灵的虚空;而心灵虚空也就没有办不成的事。“静明”指人尚向往的一种内心境界,以此为园名,表达了统治者希望于此处因“静”而“明”,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。



一直慎之又慎。然而,随着时间流逝,部分历经磨难的大典破损较重,亟待修复。2002年,启动大典修复工作被列入计划。

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杜伟生是当年负责《永乐大典》修复工作的专家。据他回忆,在借鉴修复馆藏敦煌遗书经验的基础上,修复组制订了一个简明修复方案,并申请试修一册《永乐大典》。在试修过程中,他们就碰到了修复材料的选择和采购难题。

原来,《永乐大典》的书页为皮纸,书皮是用粗丝绢制成的。杜伟生介绍,在选配修补纸方面,国家图书馆还有一定优势,修复组保留着一些清代早期的皮纸“高丽纸”。用这种纸来修补《永乐大典》,无论从纸张年代还是从纸张纤维结构来说都非常合适。

而寻找修补书皮的丝织品,他们却着实费了不少功夫。《永乐大典》的书皮是用绢包裹的。明代的绢和现代的绢大不相同,首先是经纬线比较粗,厚度也比现在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绢要厚得多。当时修复组派人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各个丝绸销售点,还是找不到合适的绢。“最后我们找到一种生丝织品,它的外观和大典书皮用料相仿,薄厚也差不多。我们将生丝织品用传统的中国画颜料刷染上色,使新换的书皮和接补部分的颜色与原书皮颜色相近。”

这册试修的《永乐大典》修复效果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认可,大典修复工作就此全面展开。杜伟生没想到的是,有些大典的破损程度超出了原来的估计。大典不能像其他书一样拆散铺平修,而只能以“掏补”为主,就是在不拆掉书皮和纸捻的情况下,把毛笔、补纸伸进书页中间修补破洞。因此,补几页就要停下来,否则破洞在相同位置的书页就会被糨糊粘在一起。这样一来,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速度就快不了。

最终,经过9个多月的努力,161册《永乐大典》除了3册曾经整册托裱的以外,其余158册全都经过修复,恢复了成书时的原貌。杜伟生和他的同事们松了口气:“要让子孙后代看到大典所承载的历史。”

1951年8月20日,周叔弢先生率先将家藏的一册《永乐大典》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:“珠还合浦,化私为公,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。”随之,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。在张元济先生倡议下,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,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北图。此后,北京大学也将4册大典移送北图……流失海外,远离故土的大典也陆续回归祖国的怀抱。至1965年,北图馆藏《永乐大典》已达到220册。

“现存的《永乐大典》越发珍贵稀有,每发现一册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。”李坚说,此次活动中有幸和读者见面的《永乐大典》,就有最近入藏国图的两册,它们的回归都是一段偶有所得的传奇。

1983年,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一册《永乐大典》。据说,当时中华书局做了《永乐大典》挂历,孙洪林看见后,说“这东西我家也有”。北图得到消息后,派专家到孙洪林家中一看,居然是真的!发现时,这册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虽经不在,书里夹着花样、鞋样。幸运的是,当时农家妇女虽不识字,但敬字惜纸的传统,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下来。

2007年,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到华东核查古籍善本时,听说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的女士家中存有两册《永乐大典》。为此,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先后进行了4次鉴定,最终确认无误,入藏国图。

李坚说,这些年虽有热心人士找到他们,说自己发现或收藏了《永乐大典》,有的甚至亲自上门送书,但遗憾的是并没有真品出现。目前,国家图书馆馆藏的《永乐大典》数量停留在224册,其余存世的200余册散落在英国、日本等地30多个收藏机构中。

修复维艰

《永乐大典》太过珍贵,国家图书馆对它的保存和利用

庄子的想象力

□ 李佳霖

读庄子,如同雾里看花,他不会回答你是或不是,而是在充满张力的想象间,凭借读者的灵性去揣测万物有度

与庄子相遇是郑开人生里最快乐的事情。当还散发着书墨香的《庄子哲学讲记》摆在我面前的时候,庄子的奇诡深刻、飘逸潇洒和自由宏阔,从这本出版不久的新书中再次跳入我的世界。作者郑开——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主任,以他近30年对庄子的研究,生动诠释了在现代与庄子不期而遇,并与其进行心灵对话,探访寻觅庄子哲学思想世界和精神境界的酣畅感悟。他用著作《庄子哲学讲记》告诉人们,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庄子。

在郑开看来,《庄子》是一部奇书。庄子既善于以汪洋恣肆、神鬼莫测的文字表达空灵深邃的哲学思考,呈现超逸出尘、天马行空的精神境界;同时又善于忧愤其辞,

使人不容易准确把握其思想内涵。其思想的深刻性与文字的消遣性浑然一体,让千百年来《庄子》的读者和解释者或醍醐灌顶、茅塞顿开,或疑窦丛生、困惑不已。作者想通过自己几十年的研究,通过本书,探索出一条通向庄子思想世界的路。

作者在他的十三讲里,结合其在北京大学讲授“庄子哲学”的课程,经过提炼与升华,将庄子哲学的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分为两个层次,并分别对应于“物的世界”和“道的世界”进行阐释。通过研究庄子的语言、思想、梦境,追寻道的真理和逍遥自由的精神,并结合现代科学的思维,寻找与市场经济逻辑的契合点,来逐层论证我们在现代的世界里,每个人如何与庄子不期而遇。

元青花四爱图梅瓶:

妙笔丹青韵意浓

□ 刘晓琪

绘一幅主题图案,但元青花四爱图梅瓶的主题图案却有四幅,十分罕见。它们是王羲之爱兰、周敦颐爱莲、陶渊明爱菊、林和靖爱梅鹤,均取材于人名篇与历史故事。

王羲之爱兰图,画中的王羲之宽额圆脸,盘坐在地上。他袒胸露腹,憨态可掬。王羲之是中国东晋著名的书法家,他写下了被后世称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集序》。

周敦颐爱莲图,周敦颐是北宋著名哲学家,他写的《爱莲说》闻名天下。图中周敦颐手执拂尘,立于岸边,正聚精会神地观赏着池塘中盛开的莲花。身后是一书童,他携带一把古琴,似乎正随着主人到池边抚琴赏莲,别有一番意境。

陶渊明爱菊图,可以看到图中的陶渊明手握长杖,行走于庭院之中,他正回头观望侍童手中捧着的菊花。

林和靖爱梅鹤图,林和靖是北宋人,人称

“梅妻鹤子”。只见林和靖端坐在岩石上,目光正凝视一只仙鹤。仙鹤曲颈回首,展翅起舞。林和靖头上梅花垂悬,含苞待放。

元青花是青花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,在成熟元青花极其丰富的装饰题材中,人物故事无疑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。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,描绘的四幅人物故事图既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。这突破了以往一瓶一画的格局,体现了工匠大胆创新的绘画技艺,同时也反映了元青花烧制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。

这件梅瓶身上还有一段凄婉动人的故事。郑靖王朱栋是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,去世时年仅27岁,郑靖王妃郭氏悲痛自尽,为夫殉情,这件梅瓶就是王妃郭氏生前珍爱之物。正因为郭氏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女儿,因此有专家认为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可能是皇帝的御赐之物,是青花瓷中的精品!

文化长城

《永乐大典》是明代永乐皇帝命解缙、姚广孝等人编纂的大型类书,初名《文献大成》,始建于永乐元年(1403年),五年书成,皇帝亲赐书名《永乐大典》,并撰序言以记其事。

类书,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资料性书籍,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百科全书。若要选出一部冠绝古今的皇皇巨著,则非《永乐大典》莫属。

《永乐大典》牛在哪儿?全书22877卷,3.7亿字,装成11095册。如果每天看一册,也得花30年时间。目前已知的宋元善本书,在世界范围内仅存3000多部,而《永乐大典》所收之书达七八千种之多,其中保存了大量后来已经失传的先秦至明初的秘籍史料。“说《永乐大典》是‘文化长城’一点不为过。”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说。

让后人时常感慨的,还有它的命途多舛。《永乐大典》最初收藏在南京,明永乐十九年(1421年)随永乐皇帝迁都北京,存放于皇宫。岂料嘉靖三十六年(1557年)四月,皇宫大火。嘉靖皇帝一夜连下数道命令,督促抢救大典。幸亏抢运及时,《永乐大典》才逃过一场浩劫。嘉靖皇帝决心重新抄录一部,以备不测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秋,重录工作启动,隆庆元年(1567年)副本抄录完成。

不过,此后《永乐大典》正本却不知所踪,至今仍是一桩悬案。现在存世的《永乐大典》全都是副本,清雍正之后一直保存于翰林院中。

咸丰十年(1860年)英法联军入侵北京,《永乐大典》惨遭浩劫,部分毁于战火,部分被抢,到光绪元年(1875年)时,存本已不到5000册。光绪二十年,只剩下800余册。光绪二十六年,残存的《永乐大典》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被肆意践踏。到京师图书馆接收《永乐大典》时,到馆的存本仅有60余册了。

珠还合浦

从成书11095册到仅存60余册,《永乐大典》的团聚之路漫漫。京师图书馆、北平图书馆、北京图书馆,再到今天的国家图书馆,馆名几经改变,但对《永乐大典》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。让尚且存世的大典团圆,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和几代图书人不懈努力的方向。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之后,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,《永乐大典》的收集工作开始了崭新的局面。

1951年,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,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图收藏,并借此机会与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。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,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北图集中收藏。

悦读

文物品鉴



元青花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奇葩,因为传世量少而显得弥足珍贵。带有人物图案的元青花梅瓶全世界不足10件,更是稀世珍品。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是其中的代表作。它于2006年出土于湖北省钟祥市郑靖王墓,高38.7厘米,口径6.4厘米,底径13厘米。梅瓶是一种兼具储酒实用、陈设装饰和冥器陪葬等多种用途的器物,因口小仅能容纳一枝梅花而得名。

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上的图案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层,梅瓶肩部为凤穿牡丹图;器腹中部有四个菱形开光,分别绘有四幅人物故事图案;梅瓶下腹部以莲瓣纹和忍冬纹装饰一周。整体梅瓶造型精巧规整,釉面细腻光洁、发色鲜艳青翠,是一件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精品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件梅瓶腹部的四幅人物故事图。通常情况下,一件元青花瓷器仅描